

特别策划

传统礼仪与
现代文明

编者按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礼仪之邦”的美誉，礼仪文化在我国古代文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但自20世纪初以来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屡遭冲击和毁损，给我们的文化传承和社会运行带来诸多问题和不利影响。在当代社会如何传承我国礼仪文化遗产，合理重建我国传统礼仪，如何使传统礼仪与现代文明相融合，是全社会和学界都很关注的重要话题。萧放教授近年来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人生仪礼传统的当代重建与传承研究”，带领专家团队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于2022年获国家出版基金资助，2023年出版了结题成果《有礼如仪：人生礼仪文化的当代重建与传承》（本专题简称《有礼如仪》），是近年来关于中国礼仪研究的代表性著作，引起相关学界和社会的密切关注。2024年7月30日，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与江西教育出版社联合举办《有礼如仪》出版座谈会，邀请来自全国十余所高校和科研单位的专家学者对该书成就、特色和当代社会礼仪传承与重建问题展开热烈讨论。这里我们选取部分学者的文章和言论，希望能切实推进我国当代传统礼仪传承与重建问题的学术研究和社会实践。

当代社会礼仪传承与重建的意义、策略和路径

安德明 周飞舟 林继富 杨华 张勃

[中图分类号] K89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7214 (2025) 01-0101-12

DOI:10.16814/j.cnki.1008-7214.2025.01.005

提炼文化基因，推进当代文化建设

安德明

传统文化的历史发展及其在当代社会建设中的作用问题，是包括民俗学在内诸多学科长期关心的重要话题。萧放教授和他的团队完成的《有礼如仪》这部著作，通过对人生仪礼的传承与当代转化发展的深入探讨，为上述问题的研究贡献了一部厚重成果。除了选题具有突出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之外，该书尤其在以下两个方面体现出有启发性的优点。

首先，是“文化基因”角度的意义。该书附录中有一项内容，是九年前该书课题组召开开题会时与会者提出的意见建议实录。作为当年的参会者之一，阅读这些内容，当时开会的场景仿佛就在眼前！这当中也有我的发言，其中我提了这样一个建议，就是希望课题组能够通过对丰富多样的中国传统礼仪的系统研究，从中提炼出一些最基本的要素，比如最核心的概念，或者基本的框架，作为传递给大众供其选择参考的基础知识，这样将既有利于揭示中国人生仪礼传统的内在规律，又有助于当代社会礼仪文化的重建。从该书目前的具体内容看，我的这个建议还是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采纳，在全书讨论中有较多的体现。

之所以要提及这一点，是因为它与“文化基因”的提炼密切相关。“文化基因”，是在当前社会生活变迁更加剧烈快速、国内外交流日益密切广泛的背景下，国内学界越来越普遍应用的一个新概念。

[作者简介] 安德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周飞舟，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林继富，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杨华，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张勃，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所研究员。

这个概念本身，在学理上或许还有诸多可以进一步探索完善的地方，甚至存在一些争议，例如，有的意见就因其中体现的基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种族主义倾向而对它保持高度警惕与批评态度。但是，从这一概念目前变得日益流行的事实，我们却能够看到国内各界对于总结民族文化核心要素的迫切心理，尤其值得借鉴的，是它的确能够为我们思考文化传统的内在属性提供基本的工具。

就本书的内容而言，借助“文化基因”的概念来看，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到底有哪些可以提炼的内容呢？

事实上，作为本书基础概念之一的“礼仪”，本身就属于中国文化基因最核心的组成要素之一。在素有“礼仪之邦”之称的中国，礼仪在传统文化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它不仅是一种行为规范，规约人们的行为，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更是一种社会理念和伦理精神的体现，深刻体现着民族的伦理精神与道德观念。围绕礼仪这一元概念，又可以细分出一系列次一级的概念，比如社交礼仪、节庆礼仪、人生礼仪，等等。而人生仪礼作为影响最为广泛深远的一类礼仪，在探索中华文明、中国文化的本质属性方面，尤其能够提供诸多的可能性。正是在此基础上，本书针对人生仪礼的传承与当代重建问题展开了集中讨论。全书按照人生仪礼在人的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表现及特征，把它分为诞生礼、成年礼、婚礼、丧葬礼和祭礼五个大类，紧紧结合“当代重建与传承”的主题分别进行细致梳理和分析。这样的划分，符合人生仪礼的内在结构，也突显了“人生仪礼”范畴下五个关键范畴的“文化基因”属性。例如婚礼，自形成之初，就已经具备“文化基因”的属性。有关三皇之首伏羲或伏羲女娲相关的神话，讲到这些人类始祖的丰功伟绩，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他们制嫁娶、定婚姻——这是他们之所以被后世奉为人类始祖及文化英雄的重要原因。作为人生仪礼有机组成部分的婚姻制度及相关礼仪在民族文化传统中的重要地位，也由此可见一斑。再如祭祀礼，无论祀神还是祭祖，都是中国传统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社会实践与社会关系。如孔子所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这种礼仪，是中国传统中把个体、把当下的人同群体和过去、同有关宇宙的超自然理解相连接的重要媒介，也是人之所以成为群体之一员、成为历史性存在的重要基础。

全书在对人生仪礼五大类内容的展示和分析中，让我们看到了人生仪礼活动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多样性、多元化的表现，也揭示了仪礼传统在本质上高度统一的特征。以其中有关诞生礼的讨论为例，按照书中的介绍，诞生礼仪的各个环节，诸如求子、孕育、洗三、抓周等，其中的具体活动在不同地区、不同时代，往往大不一样，甚至具体的叫法也各不相同，例如抓周活动，以传统方式安排的供幼儿抓取的物品，通常都是文房四宝、儒释道经卷和秤尺刀箭等，近现代以来则陆续增加了指南针、地球仪、相机、鼠标之类的物品。通过比较这一类的变化，作者让我们看到了礼仪实践环节的千姿百态。

但与此同时，全书又让我们看到，仪式中最核心的要素、最基本的规则却相对稳定，很少变化。每个地方的人，从出生到死亡，从人生的起点到终点，每一个阶段都有着必须遵循的基本行动规范——出生有诞生礼，成长有成人礼，结婚必须举行婚礼，故去又有安葬礼，为了表达追忆祖先和敬畏自然之情则要举行祭礼。每一种礼仪，构成了中国文化基因中的核心要素，它们既有不同的表现方式，又有突出的统一性。仍以抓周为例：尽管活动的具体形式因地区或时代不同而千差万别，但孩子到了周岁要举行抓周仪式的观念和实践却始终如一。

这一点可以说是该书一个显著的特征：一方面为读者展示了人生仪礼具体实践丰富多彩的样态，另一方面，又梳理、提炼、展示了最具内聚性或最为核心的规范。令人印象深刻的一个例子，是书中婚礼部分涉及民国婚俗时，有一幅关于当时婚礼现场的秩序和方位结构图，其中除示意来宾、司仪等

人的位置之外，还显示仪式中需要在核心位置悬挂“总理遗像”，布设国旗。如果把这幅图同此前更早时的现场秩序图进行对比，我们就能看到更多有价值的东西，比如，这里的总理遗像等元素，实际上等同于过去“天地君亲师”结构中的“君”。这样的图片，其实为读者提供了更广阔的想象空间，那就是：虽然具体表现符号变了，但是，其中最核心、最基本的要素，即“文化基因”的部分，也就是属于李亦园所谓“中国文化的文法”的要素，又是完全一致的。

其次，在该书当中，能够感受到一种力求贯穿全书的知行合一思路。有先生曾谈到，萧放教授和他的团队，继承了钟敬文先生开创的民俗学传统。的确如此。不过，在我看来，萧教授在继承中又有创新和拓展。钟先生的学术研究，更多表现为一种文化史的取向，主要还是一种纯学术的基础研究。而萧教授所在的民俗学专业，由于目前属于社会学院的组成部分，因此，他们的研究，在文化史的视角外，又带有更多与社会治理、当代文化建设等一系列现实关怀密切关联的主动性，能够更自觉地从当代社会应用的角度来拓展民俗学的研究范围，可以说，这是对北师大民俗学传统的一种很大的发展。

这样的拓展，其实也是对中国传统士人精神的进一步的弘扬。这些精神的内容，诸如学以致用、以天下为己任、经世济民，等等，曾经激励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为民族的发展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客观上也彰显了知识或学术的基本社会价值。随着近现代以来学术研究日趋专业化，这样的传统在不少学科领域影响逐渐淡化，甚至受到排斥。该书的讨论，一定程度上重现了过去的士人知识分子的传统，也对我们重新思考学术研究的目的、目标提供了参考乃至建议。特别是就具有高度实践性、实证性的民俗学研究而言，究竟如何协调基础研究与社会服务之间的关系，这本书能够给我们很多的启发。那么，作为知识分子，尤其是作为有社会使命感的知识分子，我们能够为解决当前社会文化传承发展中的相关难题提供怎样的参考意见呢？该书的答案是，在传统礼仪发展传承的过程当中，我们一方面要关注传统自身的自发性——其自发调适、转变和再创造的问题，另一方面，我们也能够从主动文化干预的角度，提供相应的建议和对策。例如，书中谈到如何引领当代人生仪礼传承转化的思路时，提出的基本方案是，既要关注人伦——人伦又是中国文化基因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要素——同时，又要维护个体的尊严和个体的价值。相关的思路可谓十分清晰。

总的来说，本书通过把田野调查资料和文献资料有机结合并系统探讨，清楚地展示了如何把传统材料转变为当代文化建设的有机资源的途径和方法。它不仅在对基础研究与当代应用转化有机融合方面作出了有益探索，而且为相关同人提供了可资参考的路径。当然，在此基础上，假如能够进一步对人生仪礼传统在传承与当代重建方面的整体属性与规律进行总结和分析，全书的理论价值与方法上的启示将会达到又一个新的高度。

礼仪重建与家庭凝聚力

周飞舟

《有礼如仪》一书从民俗学、社会学角度切入讨论礼仪重建的问题，对当代社会治理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在现代社会中，“礼”的问题经常会被弱化和表面化为“礼貌”“礼节”的问题，而忽略

了礼是直通人心深处、具有贯通个人心性和社会秩序的重要桥梁的作用。《有礼如仪》的研究和出版工作在这方面的意义是如何称赞都不过分的。

首先，从社会学的层面来看，社会学基层治理最基本的单位并不是个人，而是家庭。社会学前辈费孝通在 1996 年在谈到全国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时，指出了保持中国社会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一个主要因素。他打了一个比方，把“人人心里都有一个家”比作“摸着石头过河”的石头。^①

北大社会学系沿着费先生指的这个方向，做了很多城乡发展的研究，这些研究其实也都证明了这个观点的洞察力和预见力。我们有两个团队在做关于中国当代人口流动的研究。从表面上看，中国两个多亿的农民工离开了家庭，这在全世界都是罕见的现象。调查发现，很多农民工都有两个或三个家。如果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来看，中国的家庭规模平均只有 2.62 人，不到 3 人。这是中国社会具有高度流动性的表征，并不足以说明中国人的家庭真的变小了，而是由于人口流动和统计的问题，一个家分成了好几个家。在调查的过程中，我们感触最深的一点是家庭具有非常强的凝聚力。虽然是两个或三个家，但上一代人挣的钱主要是花在下一代人的人生礼仪上。我刚在江苏江阴做了十天的农户调查，很多农民挣一辈子钱，一次性就给孩子买了房子，之后他们在农村里靠土地流转费、农保、社保等生活。每个人作为连接上一代人和下一代人中间的一个环节，每个人把自己的人生使命看作是要连接、延续这个链条。这样一来，全家好几代人都会把重心放在最小的那一代人身上。比如上学的时候他是否能去到好的学校，是否能买到学区房，毕业了在哪工作以及在哪买房。如果合全家人之力买不起，就付个首付。同样，离家在外的农民工心里想的都是怎么挣钱养家。这些都是中国家庭文化的传统，对中国当代社会稳定、对经济发展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在这个过程中，“家”也面临着逐渐分散和分裂的挑战。

中国人对家庭具有一种类似于半宗教式的皈依感。家庭的凝聚力如何在现代社会中保持，则和礼仪的当代重建有着密切的关系。比如，人生礼仪到底还要不要做？一个农民工去外地打工，但村里的红白喜事他都会参与。只要他结了婚，他就是村里的一份子。表面上看，他的常住地虽然不是村里，但他对家庭、对家所在的村子、对社会都有一份责任感。因此，礼如何在城镇化的时代持续下去是一个重要的社会议题，尤其是“礼”对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作用可能还没有被充分认识到。

其二，我认为《有礼如仪》综合了多学科的成果，礼的研究也确实需要多学科才能完成。它既讨论了经典当中的问题，又有当代社会中的民俗研究，还有关于礼的政策讨论，其中每一个部分都可以展开更加深入的研究和讨论。

其三，受《有礼如仪》的启发，我认为礼的重建需要立足当代。人的重要性、人的尊严价值问题都是现代社会的根本问题和当代文明的核心观念。礼的重建并不是凭空重建，而是因时损益。不论是葬礼还是婚礼，《朱子家礼》都是特别有意义的参考文献。因为朱子当时面对的问题和我们今天面对的礼仪重建的问题是类似的。朱子对礼的因时损益的认识、对礼的核心的把握，对今天都有重要的参

① 费孝通(1996):“这几年大家看到巨大的民工潮,几千万的民工从内地涌向沿海比较繁荣的城市,这也是创纪录的人口流动,很多人很担心。但是至今没有引起混乱,那是外国人难于想象的。我曾推敲这个原因。我看到了一个稳定的因素,那就是在新兴城市打工的民工,每人几乎都有一个家在内地。他们得到工资后除了生活必需的开销之外,定期地寄回家去,过年过节有可能的就回家去呆上几天。如果城市里找不到工,如果停工了他们有家可回。有工做,心里踏实,工停了也不用着慌。我过去没有理会到农村里的承包责任制在新兴的城市也会有这样强大的安定民工的力量。换一句话说,我没有估计到农村现行的制度是建设现代都市的支持。我们不就是摸着农村里有家可归的石头在渡工业现代化的河吗?”

考意义。此外，与其他社会现象或者社会规范不一样的是，礼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的情感表达方式。礼要求我们以某种特定的方式表达某种特定的情感，而这个情感还要有感染性和带动性。礼的这种特征与很多仪式的特征类似，但礼还不止于此。例如，从丧礼到祭礼，是一个情感从悲痛变为尊敬的过程，“哀”越来越少，“敬”则越来越多。与其他文明中的仪式不同的是，礼还有以对方为重的原则，即克制自己、表达感情。这种精神与中华文明的一些根本性价值是一脉相承的，这种精神如何在当代礼仪重建中保持下来，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民俗学本源传统的现代观照

林继富

《有礼如仪》的出版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我认为主要体现了对于民俗学本源传统的现代观照。

第一，界定了人生仪式的基本范畴。著作调查且分析了诞育礼、成人礼、婚姻礼仪、丧葬礼仪等人生主要的礼仪规范、生活实践。著作提出的诞育礼我们经常叫诞生礼，著作采用诞育礼不仅在内涵上、而且在外延上都超越了诞生礼。同时，著作特别提出了祭祀仪礼和礼仪的综合研究等，可以说将人生礼仪的范围有些扩大，但实质上是从事系统性的立场分析人生礼仪，这就使著作并非就人生礼仪讨论人生礼仪，而是将其放在中国社会结构、中国人的生活系统中来分析，系统深刻展示人生仪礼的意义，这对于理解人生礼仪有明显的创新。

第二，锚定人生礼仪的根本传统进行重建。重建礼仪的根本传统是什么呢？著作通过研究主要选取《仪礼》和《朱子家礼》，以此为根本摘取与当代社会相关的仪礼讨论如何实现重建。无论是《仪礼》也好，还是后来的《朱子家礼》也好，都跟儒家传统有关系。那么儒家传统作为根本传统重建或者是传承，在当代社会里面怎么体现，这是很重要的问题。同时，人生礼仪在传统礼仪重建中的价值和影响力显然是以人为根本的传统礼仪，这就使人生礼仪传承和重建围绕以人为根本的传统赓续，传承和重建就显得迫切和紧要了。

第三，创新礼与俗的互动关系。礼是什么？礼是传统。那么传统是什么呢？比如说民俗学里有很多传统，我觉得传统有两个层次：第一个是悬置起来的，这是建构的传统。比如说民间故事类型。类型是什么？我们往往觉得就是简单的分类，但我一直认为类型不仅仅是分类系统，它是被建构起来的传统的系统。传统礼仪，比如说礼仪活动中的座位是有意义的，舅舅坐哪里、姑姑坐哪里都是有规定的。这个规定在不同民族、不同地方有些差异，但是它同样是礼仪传统，所以礼作为传统是被建构起来的。当然这个传统一旦被具体化、具象化到生活的时候，它就变为具体生活了，有血有肉，有情有感。著作在这里谈到礼和俗的时候并非孤立的，而是与地方传统相联系，比如说和信仰联系，和生活行为联系，于是，礼与俗就成为彼此依存、相互成就的生活了。同时，著作在讨论礼与俗的过程中，特别提到“乡贤”，这是很大的创新。礼进入俗，或者礼俗互动，乡贤就是桥梁、中介。这些乡贤是文化人，传统社会特别尊重文化人，文化人引领乡村社会发展和礼俗建构。著作谈到乡贤在礼俗互动中间的特殊作用是非常重要的贡献。

第四，著作推动民俗学学科服务于社会，服务于国家建设的方向。学科发展、学科建设需要为社会建设、为人民生活改善和国家重大战略服务。著作从多个方面体现了人生礼仪研究与社会治理和乡风文明建设紧密关联。著作中的礼和俗离不开社会团结，社会团结当然是传统的共同性。著作显然抓住了民俗本源性传统，就是关于团结、凝聚力、共同进步等问题。《论语》里的“克己复礼”，“克己”就是去掉自己的私欲，而“礼”就是日常，是被大家遵循的共同性的日常。因此，著作对于人生礼仪分析强调共同体的团结与凝聚力。这就使著作在调查研究“礼”“礼俗”过程中彰显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

“大礼学”研究与民俗学实践

杨 华

《有礼如仪》是萧教授主持的国家重点课题“人生礼仪传统的当代重建与传承研究”的结晶，是一项优秀的成果。我相信这本书的出版，一定会推动礼俗文化的研究，在民俗学和礼学研究方面留下一笔重要的财富。

下面想谈几点读后感。

第一，该书的主旨与本人一向主张的“大礼学”研究旨趣完全相同。大家知道，狭义的礼学研究只是“三礼”文献研究，是千百年来中国传统学术中最艰深的部分。近年来我一直主张，开展广义而不是狭义的礼学研究，即更多地研究附着在“三礼”文献中的礼制信息。《有礼如仪》的研究旨趣，正与我个人的想法相同；换言之，它正是广义礼学研究的一个分支。

所谓广义的礼学研究，实际就是中国文化史之学，它包括礼学、礼义、礼制、礼典、礼俗、礼法、礼乐等，其中每一个礼的门类都有深厚的学术前史。前人对这种广义礼学的论述很多，从章太炎、辜鸿铭、柳诒徵、周作人、李安宅、江绍原，到钱穆、沈文倬、钱玄、刘志琴等学者，都有言及，我曾在多篇文章中梳理过相关学术史^①。其中大家引述最多的，便是钱玄先生《三礼辞典》导言的开篇所论：

古之所谓礼，本指祭祀鬼神之事，随社会发展，礼之范围逐步扩大，由祭祀之礼而及于人伦之各种规范，再而至于有关政教之典章制度。今试以《仪礼》《周礼》及大小戴《礼记》所涉及之内容观之，则天子侯国建制、疆域划分、政法文教、礼乐兵刑、赋役财用、冠昏丧祭、服饰膳食、宫室车马、农商医卜、天文律历、工艺制作，可谓应有尽有，无所不包。其范围之广，与今日“文化”之概念相比，或有过之而无不及。是以三礼之学，实即研究上古文化史之学。^②

萧放教授在《有礼如仪》的导论中，也梳理了相关学术史。他对“礼”的理解，并没有完全自限于“三礼”文献学研究，而是重点放在当代礼仪实践。对此我深表赞同。

^① 杨华：《近 30 年来中国礼学研究的进展和问题》，刘玉堂主编：《楚学论丛》第十辑，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22 年，第 379—390 页。杨华、彭壮壮：《如何研究和叙述中国礼学通史：从〈中华礼制变迁史〉谈起》，《中国史研究动态》，2023 年第 4 期；《人大复印资料·历史学文摘》2023 年第 4 期。景灿涛：《礼学就是文化史之学》，《中华读书报》，2022 年 6 月 8 日第 15 版。

^② 钱玄、钱兴奇编著：《三礼辞典·自序》，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年，第 3 页。

基于上述“大礼学”观，我们曾组织了不少礼学活动，可与萧教授的相关研究相呼应。2018年，我们把从不同角度开展礼学研究的学者请到一起，举办了一场“礼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国际学术会议。这是在礼学、礼义、礼制、礼典、礼法、礼乐等不同领域辛勤耕耘的学者首次同堂相聚，切磋大礼学问题，可以算是一场跨学科的国际盛会，会后我们编辑出版了论文集《经国序民：礼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国际学术论文集》^①。后来我承担了“中国礼仪文化通史”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编辑出版了《中国礼学研究概览》^②，组织出版了“礼学新论”丛书（共十卷，2024年已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齐），举办“珞珈礼学研习营”和“三礼研究工作坊”，此类活动都是按照这种理念进行的。

第二，该书对礼俗关系的研究有所推动。个人认为，这本书的出版是此种大礼学观念在礼俗方面的一个剖面。它把礼俗互动、礼俗传承、礼俗转换等问题都展现出来，具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诚如其他学者所论，该书各章节在叙述时，很好地展现了由传统之礼演变到当代之俗的历史过程。作者或许在某些地方讲得不令人满意，不能遽成定论，但这种努力非常宝贵，其学术理路是完全正确的。如果没有这种工作，我们现在的某些民俗研究，就是无根之草、无本之木。

关于礼与俗的关系，我认为有几点值得注意：其一，礼是精英文化，属于上层社会；俗是流行文化，属于下层社会。其二，礼起源于俗，但下层庶民的生活习惯一旦被上层社会吸收并赋予国家意志，则成为礼制、礼典之类，具有指导性和强制力；而俗则多来于自发，即所谓“习惯成为自然”。其三，礼的影响范围更大，可以视为文化的“大传统”，即雅文化；而俗的影响范围可能是区域性的，只是文化的“小传统”，即俗文化^③。这都是一些人所共知的常识，我们当然还可以做一些补充，甚至可以定出某些硬性的指标以区别二者。

通过学习该书，我们对礼俗关系还有一点体会。礼是主流社会要维护的内容；而俗则是不可阻挡、时人不得不顺应的东西。中国历史上历来如此，朱熹制礼就多次强调“礼时为大”^④，主张“从今”“从时”，而不要过分拘泥于上古制度。近代以来，中国的很多传统礼制也随时而变了，掺入了西礼、新礼，成为“新民俗”。以最近一百多年的历史过程而言，这些新民俗的创造大约有三次大高潮。高潮之一是清末民初。1918年岁末，北京大学一批青年创办《新潮》杂志，傅斯年所撰的发刊词就称要“脱弃旧型”“渐入世界潮流”。当时很多留学生回国后，为了顺应世界潮流，追求“新文化”，制造了一些“新礼”。例如“文明结婚”的仪式，便创制于当时，今天婚礼的很多程序看似很古老，其实就始于那时。高潮之二是1949年之后。新中国又创制了一批“新礼”，比如开会仪式、丧葬仪式、宣誓仪式、迎宾仪式，等等。高潮之三就是21世纪。今天，社会上流行着各种各样的礼仪服务，包括婚庆、寿诞、开业、丧葬等仪式，城乡都有所谓红白喜事的“一条龙”服务。我们很多习以为常的礼仪活动，仔细想想其实才诞生了不到20年，都是在全社会富裕之后，一些礼仪公司为了赚钱而制造出来的“伪民俗”，只不过大家“习焉而不察”了。无疑，这些新民俗、伪民俗经过一段时间的广泛流行，经过自然淘汰，一部分将成为所谓的“礼”，逐渐影响未来。因为社会大众的选择总是从简、从俗，取低而不是就高。

① 杨华、薛梦潇编：《经国序民：礼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国际学术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

② 杨华主编：《中国礼学研究概览》，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21年。

③ 杨华：《化礼成俗：〈礼记〉与日常生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辑刊》，2023年第4期。

④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八十九，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275页。

作为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难道我们对之束手无策吗？也不尽然。历代社会精英总是想维护旧礼，使古老的传统尽量消失得慢一些；同时，历代知识精英都在进行“移风易俗”的努力。如上所言，朱熹制礼时有“从时”的一面，但更多的则是遵循旧礼。他撰写的《仪礼经传通解》按照家礼、乡礼、学礼、邦国礼等篇次，把礼制重新编定了一遍。其目的是为了实用，其参照基础就是《仪礼》和《礼记》等上古文献，而不是当时（宋代）社会上流行的各种流俗文本。《朱子家礼》只不过是上古、中古礼制的简写本。历代知识人“制礼”时，都带有改造社会、传承文明的伟大抱负^①。例如，清代前期学者研究礼，并不完全是知识操练，也不完全是清初政治高压之下的学术反动，而是为了挽救明末以来颓唐堕落的社会流弊，从而进行的“净教”运动^②。今天亦然，我们决不能认为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而应当接过前人移风易俗的旗帜，使社会风俗尽量维持在基本的道德水平之上，而不是一味迎合，导致社会风俗过于低劣。

第三，该课题的完成和该著作的出版，都很好地回应了课题开始时专家们的若干意见。我们阅读该书后面的“附录”，便知晓当年该项目在开题时诸位专家提出的不少问题（有些专家今天仍然在座）。该著作成书时，回应了学者们的建议，也做出了很好的设计。例如，作者根据开题专家们的建议，没有做出一个“礼仪手册”，或者说，放弃了“制礼作乐”的构想，这是明智之举。在今天，关于制定《通礼》的呼声仍然时有所闻。它之所以迟迟没有变成现实，正是因为无论怎样制礼作乐，都不可能满足全社会、全民族的需求。一方面，我们希望有这样的制礼作乐，来彰显民族个性和国家特色；另一方面，却又深深感到用一种固定的模式来限定全社会各个阶层的生活样式，反而限制了公民自由和文化多样性。故而此举迟迟未能付诸实践。又比如，有专家在开题时，提到要对土家族的礼仪进行调查和叙述，这些内容都在该书中得到了彰显。

同时，我们也看到，该书在不少地方仍然显示出主编的“坚持”，这些内容殊为宝贵。例如，主编坚持按照人生礼仪的模式来叙述礼仪的“重构与传承”。作者认为，人生礼仪就是诞育、成人、结婚、丧葬、祭祀这五大块，全书围绕这五大部分展开叙述。这确实抓住了礼俗关系或礼俗转化的关键环节。中国上古和中古的“五礼结构”，转变为《朱子家礼》之后的“四礼结构”，这是中国礼制史的主线。影响中国人日常生活最深的，当然就是该书所论列的五大块。又如，在开题报告上有不少专家指出，“重建”当代中国日常生活时，其背后的“结构”非常重要，希望该课题揭示这种结构。但是，该书在叙述时并没有特别注重这些结构，反而花了更多的篇幅去描述当代礼仪生活中的细节，叙述它们的存在。个人觉得，这实际上是一种文化功能主义的眼光，旨在揭示这些礼仪的现实作用和实用功能。民俗学者、文化学者所要做的，是描述现实礼俗生活中的现象；制度史研究者则要揭示这些文化现象（或者民俗现象）背后的结构和逻辑。这两者孰优孰劣？很难选择。目前该书只做到了第一种，即描述现有的民俗。可能是由于我们触手所及，皆是中华文化的影响，“只缘身在此山中”，无法从世界文明比较的视角来审视自己的“所在”，反而得不出这种文化背后的结构和逻辑，这是不得已的事情。

① 杨华：《中国古代的家礼撰作及其当代价值》，《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收入杨华：《古礼再研》，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年，第246—263页。

② [美]周启荣：《清代儒家礼教主义的兴起：以伦理道德、儒家经典和宗教为切入点的考察》，毛立坤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年。张寿安：《十八世纪礼学考证的思想活力：礼教论争与礼秩重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第四，该书采用“实践民俗学”方法，很好地发挥了民俗学的优势，这是礼学研究中特别值得提倡和学习的理路。礼学研究大多是历史叙述和仪典复原，无论是从国家制度的角度，还是从人物事件的角度，或是从思想信仰的角度，都力图将礼制活动置于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研究。但是，这些学者大都缺乏当代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敝公众号“礼乐微言”的口号是“遗俗求诸四野，古礼用契当代”，但平心而论，我们对于“当代”的了解相当有限。如何在传统礼制与当代民俗之间架起一道桥梁，如何发现它们的内在联系，并为移风易俗做出贡献，并非易事。该书做了大量的田野工作，通过调查研究，试图揭示古礼在当代的传承，这种努力非常宝贵，值得学习。

最后，沿着上述思路，尤其是第四点的思路，我还是想指出一点阅读该书的意犹未尽之处。原课题题目是“重建”，但是该书重在“描述”，却较少言及“重建”。如何认识这些被调查、被描述的当代人生礼仪？孰优孰劣，全书缺少价值判断。当代百姓日常生活中的若干细节，已经去古甚远，呈现出一种“不古不今，不中不西”的样式，全书对之缺少说明。赞同也好，批判也好，总需要有些态度。这是我们所期盼的。

回应时代主题，传承重建礼仪

张 勃

《有礼如仪》是萧放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人生礼仪传统的当代重建与传承研究”的成果，2015年3月，我和数位学者受邀参加了该项目的开题会。2016年第1期《民间文化论坛》发表了当时学者的发言，我的发言也以《民俗学研究的视角和方法：从日常生活体验说开去》为题进行刊发。《有礼如仪》将这些发言作为附录收入书中。当时的发言中，我用“为什么重建，重建什么，在哪里重建，又如何重建”来谈我对人生礼仪当代重建问题的思考，也特别希望研究团队能够解答这些事关礼仪当代重建和传承的核心问题。今天，我们看到，《有礼如仪》用学理的思辨、深入的田野调查成果很大程度上解答了这些问题，令人受益匪浅，也因此特别感谢江西教育出版社对该著的出版。

关于该书的贡献想谈三点看法。

第一，该书丰富了人生仪礼的内涵和外延，具有理论创新意义。

中国传统礼仪有自己的分类标准，一般来讲，吉、凶、宾、军、嘉是传统礼仪的基本分类。其中重要者，如《礼记·昏义》所概括的有冠、婚、丧、祭、朝、聘、射、乡等八种，所谓：“夫礼始于冠，本于昏，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于射、乡，此礼之大体也。”但其中并没有关于人生仪礼的明确表述。人生仪礼是从个体生命周期角度构建的礼仪系统，对人生仪礼的研究是民俗学的重要内容。在目前民俗学的人生礼仪研究中，通常主要讨论诞生礼、成年礼、结婚礼和丧葬礼，该书则在讨论上述四种礼仪的同时，将祭祀礼仪纳入研究的范畴，并给予充分的重视。祭祀礼仪是丧葬礼结束之后仍对逝去亲人给予礼敬和纪念的仪式，将其纳入人生仪礼的范畴，既丰富了人生仪礼的内涵，也拓展了人生仪礼的外延，在民俗学人生仪礼研究上具有理论创新意义。当然，为了更好地帮助大家理解这一理论创新的意义，还可以对将祭礼纳入人生仪礼研究范畴进行更系统的阐释。

第二，该书有着向善的强烈诉求，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

在该书“前言”中，萧放教授对传统礼仪的民俗学研究进行了十分深刻的思考，提出“回到中国古代思想史，对‘礼’的丰富内涵和文化特性进行全面把握，应是进行礼仪研究的首要任务。”尽管如此，该书的主要目的却不在于此，而是有着服务于现实的强烈诉求，或者说在求真之外更有向善的强烈诉求，是民俗学者自觉致用、实践的立场。

这一立场既反映在该书前言关于“人生仪礼研究价值”的论述中直接宣称“人生仪礼传统及其当代实践的研究体现了应对文化危机与困境、重建公共生活秩序的现实关怀”；亦反映在具体章节中往往都有关于重建的对策建议，如诞育礼仪当代重建与传承的对策建议、成人礼仪的重建构想、传统婚礼重建的路径思考、丧葬改革建议，等等。这些意见和建议在系统梳理历史文献以及对当下礼仪实践的现状进行深入调查和思考的基础上提出，颇具启发性和政策参考价值，值得充分重视。

当前，恰逢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两个大局”相互交织、相互激荡、相互影响之时，提出了许多时代课题。一方面，整个社会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个人的自主性大大增强，社会联结被破坏，很多人缺乏精神皈依，有学者甚至用一盘散沙形容当今社会的离散现象。另一方面，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又亟须形成价值共识，凝聚共同力量。在这种情况下，礼仪何为？有没有必要从国家层面重建和传承近来一度受到激烈抨击而式微失势的传统礼仪呢？解答这一问题，需要对传统礼仪进行当代价值的全面评估。我们看到，该书以不同区域、不同民族存续和重建的人生礼仪丰富案例，反映了诞育、成人、婚姻、丧葬、祭祀等礼仪在促进个体健康成长、维系家庭关系、构建和谐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实证了传统礼仪的当代价值，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三，该书践行了过去、现在和未来相贯通的研究范式，具有示范意义。

服务现实的鲜明学术立场，既使该书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社会价值，也促成了一种将过去、现在和未来相贯通的研究范式。中华礼仪文明源远流长，当代的重建和传承理应视为中华礼仪文明传承链条中的一环，与过去息息相关。既然有志于人生礼仪的当代重建和传承，便不能不回头看。如果不回头看，就不可能理解现在何以如是。研究过去，理解传统礼仪的多重面相与丰富意涵，重要意义之一就是要明确当下从何而来。重要意义之二，就是为人生礼仪的当代重建和传承找寻资源。对于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国而言，当代人生礼仪的重建不可能是全新的创造，而只能是基于现实需求对传统礼仪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那么从传统礼仪中找寻资源，就是重建和传承的可行和必然路径。

当代礼仪的重建和传承也不可能离开对礼仪重建和传承现状的全面认识和深刻洞察。作为近代以来一度饱受争议的文化传统，礼仪之式微失势是当代需要重建和传承的基本背景。然而，传统礼仪并不可能完全消失。在不适宜于它生长发育的环境，它或者像埋进土里的种子，孕育生机，等待合适的时机发芽；或者以变形的方式存在。今天，无论民间还是官方，都有对传统礼仪重建和传承的丰富实践。学者站在当下力主重建和传承，便需要对正在发生的人生礼仪传统的重建和传承现状进行观察，总结其中的经验，发现其中的问题，再对照自己的理想，提出面向未来的理念和举措方面的建议。我们看到，《有礼如仪》这本书正是将过去、现在和未来相贯通的学术实践，既对历史文献进行搜集整理分析，又对社会现实进行田野调查，还结合学者关于未来的应然设想，找出实然与应然之间的差距，并提出充分发挥传统资源的对策建议。这样的研究范式是学以致用立场的产物，也让学以致用从立场转化为真正的实践，能发挥实际的咨政建言作用。

综上所述,《有礼如仪》是本优秀的学术专著。最后,我想再谈一点阅读此书后对当代礼仪重建的一些感想。

中华文明长期被视为礼乐文明。礼在传统社会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也一度成为中华民族的标志。唐人孔颖达说:“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近人钱穆说:“中国人之所以成为民族,就因为‘礼’为全中国人民树立了社会关系准则……要了解中国文化,必须站到更高来看到中国之心。中国的核心思想就是‘礼’。”法国著名汉学家汪德迈也说:“礼治是治理社会的一种很特别的方法。除了中国以外,从来没有其他的国家使用过类似礼治的办法来调整社会关系,从而维持社会秩序。这并非说礼仪这种现象是中国文化独有的,——此现象是很普遍的,任何文化都具有的——可是只有在中国传统中各种各样的礼仪被组织得异常严密完整,而成为社会活动中人与人关系的规范系统。”然而今日之中国已不再是礼仪占主角的社会,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未来礼仪不会重新回到主角的地位。当代社会重建和传承传统礼仪,需要深刻认识礼的本质,以及礼仪如何通过重建和传承回应时代之所需、发展之所急和大势之所趋。

关于礼仪的本质,我认为主要有两点。

其一,礼仪是人类区别于禽兽的标志。人作为类,与禽兽同属于动物,但人何以与禽兽区别开来呢?关键在礼仪。正如《礼记·曲礼》中所讲:“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夫唯禽兽无礼……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明人丘濬也说:“礼之在天下,不可一日无也。中国所以异于夷狄,人类所以异于禽兽,以其有礼也。”如果不讲礼仪,就与禽兽无别,就应受到唾骂和指责,如《诗经·相鼠》所说:“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相鼠有齿,人而无止;人而无止,不死何侯?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让人成为真正的人,需要礼仪发挥作用。

其二,礼仪让人在关系中确定名分并据以践行,从而形成共生而又和谐的理想秩序。人生在世,必然要处理三种关系,一是自我与自然的关系,古人往往用天人关系来表达;二是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三是自我身心的关系。从社会成员个体角度而言,传统礼仪主要就是处理这三种关系的理念、规范和外在表现。在处理天人关系方面,传统礼仪的基本理念和规范是敬天尊地以及相关制度,行为层面就是对天地以及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山川等天神地祇的周期性祭祀。在处理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方面,传统礼仪的基本理念就是认同自己在社会关系中的角色及其责任并体现在行为上,即孔子所讲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即是一个君主就做君主该做的事,是一个大臣就做大臣该做的事,是一个父亲就做父亲该做的事,是一个孩子就做孩子该做的事,等等。当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角色做了当做事,那么就会形成良好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在处理自我身心的关系上,传统礼仪强调对个体欲望的节制和培养。荀子在解释礼的起源时这样说:“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可见礼仪要对欲望进行节制,但并非无视人的欲望,而是在人的欲望及其满足之间取得一个平衡并“相持而长”。

人生礼仪主要关涉的是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一个个体出生之后,随着年龄的增长,社会关系和社会角色会发生变化。他甫一出生,便具有了孩子的角色,便有了父子、母子等社会关系。如果他恰巧还有哥哥或姐姐,便又有了兄弟姐妹或姐弟姐妹的关系,总之,便有了各种基于血缘的关系,而在每一种血缘关系中他都有自己的角色。同时他在地缘关系中也有自己的角色。随着上学、成年、工作、结婚等,他又会在学缘、业缘、姻缘、志缘关系中占据一定的位置。这些社会角色都不是抽象的,而

是具体的，体现在日常生产、生活和礼仪场合之中。诞育礼、成年礼、婚礼、丧葬礼、祭祀礼等人生礼仪，都是个体在社会关系和社会角色发生重大变化之时举行的仪式。有一个现象很值得注意，即礼仪的主角往往都被冠以“新”字，诞育礼中的主角被称为新生儿，婚礼中的主角被称为新人，丧葬礼中的主角被称为新亡人，等等。他们何以被称为“新”的？根本在于社会关系和社会角色是新的。人生礼仪的要义就是通过各种关系都在场的象征性仪式，使礼仪的主角对新的社会关系、新的社会角色、新的社会责任产生切身的体会和认知。在传统社会，儒家对于各种社会角色的名分和责任都有明确的标准，所谓“父子恩，夫妇从。兄则友，弟则恭。长幼序，友与朋。君则敬，臣则忠”“礼之用，和为贵”。每个人根据角色存角色当有之心，行角色当行之事，就能够构建出统一和谐的理想秩序。

综上所述，礼是从人的共性角度（即每个人都面临如何成为真正的人的问题，都面临如何协调三种关系的问题）思考而确定的一套思想观念和行为规范。由此论及礼与俗的关系，从发生学意义上看，无论从哪个角度理解俗，礼都是对俗的超越。俗有欲望的意思，《释名》云：“俗，欲也，俗人所欲也。”礼是对欲望的超越，让人不要为所欲为。诚如孔颖达所说：“人各有性，嗜好不同，各恣所欲，必或反道，故以礼义时节其性命，示之限分，令不失中，皆得中道。”俗有习俗之意，许慎《说文解字》云：“俗，习也。”郑玄进一步解释说：“俗谓土地所生习也。”俗是人群在各自土地之上形成的习惯。由于各地风土不同，物产有异，地方性便成为习俗的基本特征，所谓“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礼也是对这个意义上的俗的超越，礼是努力在地方性、差异性之上建立具有普遍意义的理念和规范，以弥合地方性、差异性带来的区隔，形成价值共识。因此，如果说俗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多元，那么礼则在使多元成为“一体”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至于今天我们在全国各地人生礼俗中看到诸多共同性，正是长期以来以礼化民成俗的结果。从礼的本质出发，当代社会重建和传承人生礼仪，似乎无须过多强调个性和地方性，因为个性和地方性本来就是自然的存在，特别强调个性和地方性的礼仪重建和传承，可能只是强调了民俗的仪式化，而并没有真正拉近与礼的距离。

当代中国人生礼仪的重建与传承，应该回应时代主题，根据时代的变化和社会的需求，在传统礼仪的基础上“因革损益”，进行创新和调整。“两个大局”是当代中国的谋事之基，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自我与自然、与他者、与自身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如何让一个人成为真正的人，如何让一个人妥善处理日益复杂化的社会关系、形成与时代要求相匹配的社会角色认知，并担负起相应的责任，正是时代之所需、发展之所急，也是礼仪大有作为的地方。什么是真正的人？伴随社会的发展，其内涵必然与传统社会不同。如何让一个人成为真正的人，其方法和路径也必然与传统社会有所区别。当前的社会关系更加复杂，一方面是因为新增了一些社会关系，比如我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方案，使一个人新增了如何处理与其他国家、人员的关系问题，互联网的发达使一个人新增了如何处理与其他网民的关系问题，旅游业的兴盛让一个人新增了如何处理与陌生人的关系问题，等等。另一方面，本来就有的社会关系，无论是血缘关系、业缘关系、姻缘关系，还是地缘关系、志缘关系等，都在新的情况下发生了变化。因此，明确什么是这个时代真正的人所应具有的知识、情感、能力、观念和素养，为当今各种社会关系的社会角色定位，明确指出其责任担当，并将其蕴含在人生不同阶段的具体仪式设计之中，应该成为学者参与当代人生礼仪重建与传承工作的重要任务。

[责任编辑：丁红美]